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漢語史
研究集刊

HAN YU SHI YAN JIU JI KAN

第六輯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六輯) /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
成都: 巴蜀書社, 2003. 11
ISBN 7—80659—543—0

I. 漢... II. 四... III. 漢語史—研究—文集
IV. 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101901 號

策劃組稿: 楊宗義
責任編輯: 楊宗義
封面設計: 楊 丁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六輯)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總編室電話 (028) 86656816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政編碼 610012)
發行科電話 (028) 86662019
西南冶金地質印刷廠印刷
成都市二仙橋東三段 5 號

開本 850 × 1168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1/32

印張 13.875 字數 348 千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100 冊

ISBN 7 - 80659 - 543 - 0/H·66

定價: 35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學術委員會

丁邦新(香港科技大學)
高田時雄(日本京都大學)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挪威奧斯陸大學)
江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蔣紹愚(北京大學)
柯蔚南(W. South Coblin, 美國
依荷華大學)
魯國堯(南京大學)
梅維恒(Victor H. Mair, 美國賓
夕法尼亞大學)
梅祖麟(美國康乃爾大學)

裘錫圭(北京大學)
王邦維(北京大學)
王寧(北京師範大學)
項楚(四川大學)
向熹(四川大學)
辛島靜志(日本創價大學)
徐文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許理和(Erik Zürcher, 荷蘭漢學研究
院)
薛鳳生(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游汝杰(復旦大學)
張永言(四川大學)
趙振鐸(四川大學)
佐藤晴彥(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

編輯委員會

曹廣順(中國社會科學院)
董志翹(南京師範大學)
馮勝利(美國堪薩斯大學)
管錫華(四川師範大學)
何寶璋(美國哈佛大學)
洪波(南開大學)
蔣冀騁(湖南師範大學)
雷漢卿(四川大學, 兼秘書)
李文澤(四川大學)

劉利(北京師範大學)
宋永培(中國人民大學)
汪維輝(南京大學)
伍宗文(四川大學)
楊琳(南開大學)
楊宗義(巴蜀書社)
俞理明(四川大學)
張顯成(西南師範大學)
張涌泉(浙江大學)
朱慶之(北京大學)

本期執行編委 雷漢卿 李文澤 伍宗文 俞理明

本期編務主持 雷漢卿

目 錄

王魁偉	從《漢語史稿》看王力的語料觀	(1)
張聯榮	《孟子》趙注中的並列複合結構	(8)
孫良明	簡述《史記》“三家注”中的語法分析	(20)
肖姪曼	上古“是”“此”構成判斷句的能力	(41)
朱冠明	再談助動詞“可以”的形成和發展	(51)
李 昊	《焦氏易林》的第一人稱代詞“我”與“吾”的比較——兼論“我”、“吾”的發展演變	(71)
王鴻濱	處所介詞“于(於)”的衰落與“在”的興起	(80)
彭小琴	詞綴“老”的來源和用法	(95)
唐賢清	從“參差”看漢語副詞的形成	(109)
龍國富	姚秦譯經中的事態助詞“來”	(121)
梁銀峰	隋唐以前的“受事主語 + 及物動詞 + 不及物動詞”句型	(130)
肖蘭萍	唐宋禪宗語錄特指問句末尾的“來”	(151)
周俊勛	論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	(156)
管錫華	古代反義詞“大”“小”表年齡及其他	(165)
郭作飛	從戲文《張協狀元》看專書語料的重要價值	(180)
俞理明	“先生”古今談——兼論漢語詞彙發展中核心義對詞義蛻變的糾正作用	(189)
陳良煜	“騾、馱驢”漫議	(206)
李 玉	漢語同源詞詞群札記	(217)
楊 琳	《漢語大詞典》詞義溯源	(233)
袁津琥	釋“毛骨悚然”“雪上加霜”——讀《漢語大詞典》劄記之一	(241)

陳秀蘭	魏晉南北朝文詞語考釋·····	(248)
王 東	《水經注》詞語瑣記·····	(254)
周艷梅	《舊唐書》語詞小札·····	(262)
王寶紅	《堅瓠集》俗語詞札記·····	(268)
雷漢卿	《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臆解·····	(275)
黃錦君	“物業”小議·····	(289)
宋明慧	伍宗文《列女傳》韻語研究·····	(292)
[韓]任少英	中古次濁入聲字和韓國漢字音的聲韻對應關係 ·····	(305)
顧滿林	東漢譯經中半音譯半意譯的外來詞簡析·····	(319)
林 源	《通俗文》初探·····	(328)
譚 偉	《祖堂集》俗別字考論·····	(339)
朱葆華	《說文解字》中“野”字之古文考辨·····	(354)
王 平	上博簡、郭店簡和今本《緇衣》文獻結構差異 ·····	(360)
徐時儀	古白話專書研究的一個楷模——評《〈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詞彙研究》·····	(365)
吳慶峰	訓詁方法新議·····	(380)
羅紅昌	《左傳》《國語》中一類特殊的介詞結構·····	(395)
宋慧曼	“被、將”共現句小議·····	(404)
杜麗榮	談談“所”字短語中“所”後介詞產生的時間 ·····	(408)
周作明	東晉南朝上清經中的幾個道教用詞·····	(413)
楊 莊	《說苑》異文比勘二例·····	(420)
王 磊	《真誥》詞語拾零·····	(425)
李 晶	《莊子》“反衍”釋義·····	(432)
王建華	“立槁”釋義及其他·····	(437)
消息	·····	(70)(120)(253)(304)

從《漢語史稿》看王力的語料觀

王魁偉

《漢語史稿》是中國第一部漢語史專著，具有里程碑意義。該書問世已近半個世紀，曾多次加印和重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收入《王力文集》（第九卷），是《文集》中為數不多的經先生生前親自審閱整理過的一部著作。

《漢語史稿》一書體大思精，幾乎涉及到漢語史的所有問題。本文僅就其中與語料問題有關者，略窺王先生的語料觀並附述筆者的一些淺見和思考，請方家指正。

語料問題與漢語史研究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可靠而時代確切的語料的支持，漢語史的研究將寸步難行。《漢語史稿》是較早關注此一問題的著作，作者不但提出了要“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及“要辨別史料的時代”的標準，而且始終注意貫徹其語料觀。這一寶貴學術遺產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

在《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中，作者指出：“所謂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就是要辨別史料的時代。古人喜歡‘托古’，因此產生了一些‘偽書’，古人已經做了許多‘辨偽’的工作，漢語史研究者在這方面至少要有一些常識。有些書雖然不是‘偽書’，但是我們不應該以書中所敘述的時代為標準，而應該以著書的時代為標準。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①這一語料觀概括來說有兩個基本點：要注意語料的真偽；語料斷代應以著書時代為標準。這些觀點的提出

與當時漢語史研究中存在的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有關。如有人把偽古文《尚書》當作三代語言史料，把《洞冥記》《十洲記》《神異經》等偽書當作漢代語言史料^②；還有人用《大正藏》明版的唐代禪宗語錄研究唐代語言，用《京本通俗小說》研究宋代語言，用臧晉叔明末所編的《元曲選》里的賓白研究元代語言^③。因此，可以說王力語料觀的提出最初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這對糾正語料問題上的種種偏差，確保漢語史研究的質量，無疑具有理論指導意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處理語料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根據。

實踐表明，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問題相當複雜：即以斷代而言，沒有一個統一的斷代標準，勢必出現言人人殊的局面，如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目前就有多種說法^④。而一旦有了某種標準，又難以避免片面和不足，王力語料觀也是如此。

早在《漢語史稿》問世後不久，即有人對王力語料觀提出“商榷”。其中包括：對史料的處理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把某些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說得太遲；著書時代不能作為辨別一切史料的時代標準；材料取舍不能一律以數量多少為標準；對材料既要辨別真偽，又要從各方面選擇利用等^⑤。王先生對此十分重視，並曾虛心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意見^⑥。

在《漢語史稿》一書中，王力不僅較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語料觀，而且處處可以看到他貫徹其語料觀的實踐。他對研究對象的審查十分慎重，在談到漢語係詞產生的時代時，他指出：“《史記》裏也有一些係詞，如《豫讓傳》：‘此必是豫讓也。’但是《史記》有經後人改動的地方，這類例子又少，為謹慎處理材料起見，未敢拿來作為證據。《穀梁傳》有不少係詞‘是’字，因此書年代未能考定，也不採用。”對所謂“偽書”的問題也很審慎，在談到關於上古人稱代詞的形態問題的研究方法時，他曾提到四個方法，其中即包括“排除偽書”。在談到詞頭“阿”字的

用法時說：“它作為人名的詞頭是從小字（小名）開始的。《漢武故事》說武帝的后小字阿嬌，這還不一定靠得住，因為《漢武故事》是偽書。”在談到係詞“是”的歷史發展時，曾用過一則《西京雜記》中的語料來證明“是”在中古時期的用法，對此他在腳注中解釋說：“《西京雜記》偽托劉歆，其實是梁吳均的作品。”

總的來看，王力在語料問題上還是相當慎重的。不過，其語料觀及其實踐也的確存在某些不夠完善之處，需要補充和糾正。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商榷”者外，語料的版本問題也應成為斷代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再有就是關於“偽書”的語料價值，也應重新進行認識。例如關於《黃帝內經》的語料年代，有人祇片面強調該書的存在爭議的成書年代，而忽視該書後世版本變化影響其語料時代的事實，從而得出令人難以信服的結論^⑦。在對待“偽書”的問題上，採取一概“排除”的態度，顯然是不足為訓的。事實上王先生自己也沒有完全做到，在其他場合他還引用過偽古文《尚書》中的語料^⑧。由是觀之，在“偽書”的語料問題上，尚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⑨。

下面再結合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談談。

(1) 爲了證明“在整個上古時期，‘再’字始終祇有‘兩次’的意義，沒有‘復’的意義”，《史稿》的作者共列舉了十四個例子，其中包括“李陵詩”一例。顯然作者是將其視爲上古時期的語料的，而關於“李陵詩”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卻一直有爭論。據考，關於該詩的寫作年代，目前即有東漢、魏晉、東晉、齊梁等多種說法^⑩。唐代劉知幾即斷然否定世間流傳的所謂李陵作品，其後歷代學者對該詩的真實性也大多持否定態度。退一步說，即使將真偽問題擱置起來，而以該詩最早始見於《昭明文選》論，按以著書時代斷代說，以該詩語料來證明上古漢語史問題，其說服力也是要打折扣的。

(2) 《漢語史稿》中曾多次引用過唐代禪師語錄中的語料。“據不完全統計，從唐到清，禪宗語錄不下三百餘種。主要保存在各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中。”^①而其中出自《大正藏》明版的唐代禪宗語錄，經有關專家考證是研究唐代語言的“不可靠的資料”^②。我們注意到《漢語史稿》所引用的唐代禪宗語錄在斷代上前後有變化，舊版視為唐代語料，新版（即收入《王力文集》第九卷者）則看作唐代以後語料。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史稿》將舊版中轉引自高名凱《唐代禪家語錄所見的語法成分》中的八條禪宗語錄材料全部刪掉，改換成敦煌變文等時代更為確切的語料。由此我們看到王力先生在語料問題上不斷探索、精益求精與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3) 關於《爾雅》一書的成書年代，《漢語史稿》中說：“這部書的完成一定在漢武帝提倡經學之後，而且是經過許多人補充的。但《漢書·藝文志》裏已有《爾雅》，那麼，《爾雅》的成書也必在西漢。”^③對此，有人批評說：“《爾雅》是一部重要的漢語史資料書。討論這部書著作時代，衆說紛紜。謂作於西漢則最誤。”^④其理由是：《爾雅》在漢武帝時即與《論語》《孝經》《孟子》同立博士，且當時已有人為該書作注解，這表明如果認為《爾雅》遲至漢武帝時纔成書，那麼上述兩點均將無法解釋。

王先生對《爾雅》成書年代的推斷有兩個基點：其一是認為《爾雅》一書是為解經而作，由此推導出其成書一定要在漢武帝提倡經學之後；其二是認為《漢書·藝文志》中已有《爾雅》，由此推導出其成書必在西漢。關於前者目前學術界看法不一，此屬一家之言，這裏暫不討論。而關於後者則似有可商。我們知道，《漢書·藝文志》所載並非僅是有漢一代的書目文獻，而是一部漢以前六藝百家文獻的總目錄。因此，根據《爾雅》見於《漢書·藝文志》這一點，祇能說該書的成書下限在西漢，或說其成書可能是在西漢，而不能說必在西漢。在這里應該指出：以著書時代為

標準進行語料斷代，不能簡單地以《漢志》類的書目著錄與否為根據。同樣，書目類文獻的成書年代與所著錄的書籍的成書年代，也不應相提並論。

(4) 有人批評《漢語史稿》“把某些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說得太遲”^④，如關於“條”字成爲量詞，動量詞及名量詞詞尾化的出現時間及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等。如果追溯其原因，那就不能脫離其語料觀。王先生在確定某種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時，一貫反對憑“孤證”下結論，而比較重視其是否“常見”。如關於人稱代詞“吾”字作賓語的用法，本來戰國時代已有可靠用例，到了漢代《史記》中也有用例，但例子很少。於是《史稿》即認爲“這種結構應該算入中古時期”，理由是“到了中古時期，這種情況就更爲常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源自“例不十，不立法”之說^⑤，王先生甚至還補充一句，就是“例外不十，法不破”。他認爲這是區別一般和特殊而符合辯證法的原理，“這個原理非常重要，假使同時代一切史料都沒有這種語言現象（語法結構形式等），祇有一部書中有這種現象，這部書就有被證明爲僞書的可能。”^⑥由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王力先生在語料問題上的嚴謹與慎重。

關於漢語史研究中語料的量化問題，看來還有討論的空間，這牽涉到語料的合理開發利用及相關語言現象出現時代早晚的問題。如果機械地按“例不十，不立法”來進行研究，就有可能使某些代表新興的語言因素，祇是因爲一開始出現的時候數量較少，而得不到正確的認識。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什麼纔是偶然出現的例外呢？凡是出現的次數既少而又沒有發展的東西纔是偶然的例外。至於出現的次數雖少，而發展的勢力卻旺盛不可遏制，這正是新興的語言因素，不是偶然的例外。凡新興的事物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新興的語言因素在發展的初期，在古代進入書面語，數量少是正常現象。”^⑦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關於人稱

代詞“吾”用作賓語的時代，既然戰國時代已有可靠用例，而且到了漢代的《史記》中也有用例，那麼，完全有理由據此將該用法的出現時代定在上古。以“常見”為由將其出現時代“算入中古時期”，確實“時代相差太遠”。再如關於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漢語史稿》認為是在“唐代”。其後學術界陸續出現南朝說、晉代說、甚至西漢說等多種新說^①。當然，這些說法也不見得都能站得住腳，但從《抱朴子》《世說新語》及《文心雕龍》等唐前語料中已有較多連詞“所以”的用例來看，將其出現的年代定在“唐代”，確實有些偏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王力先生的語料觀，那就是：審慎。這是老一輩學者優良學風和治學經驗的結晶，應成為我們繼續研究和探索的基石。儘管王先生所提出的語料鑒別與斷代的標準，在今天看來還不夠完善；其語料觀及其實踐，還存在某些可商可補之處，但這些絲毫無損於先生在這一領域導夫先路和奠基之功。我們還將不斷地從先生留給我們的理論寶庫中得到有益的啓迪和指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注釋〕

①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三節漢語史的研究方法、該引文腳注中說：“例如范曄著《後漢書》，范是南朝宋時人，《後漢書》不能代表宋代的語言。《三國演義》敘述劉備、曹操等人的話，都不能代表三國時代的語言。劉備三顧茅廬時留給諸葛亮的信，諸葛亮隆中高臥的詩等，也不能代表當時的語言。”

②見張永言《從“聞”的詞義說到漢語詞源學的方法問題——追答故傅東華先生》，載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二十二輯《漢語論叢》。

③見梅祖麟為《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所作“序”。

④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據筆者所知即有：六朝說，唐代說及折中說，其中“折中說”又可細分為三種意見。詳見拙稿《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

⑤見洪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載《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又見《關於漢語史材料運用的問題》，載《洪誠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⑥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語法部分的一條腳注中說：“我一向以為係詞始於東晉，盛於南北朝。1956年夏天，洪誠先生對我說，《論衡》裏有許多係詞的例子。我因此得以修正我的結論，謹此致謝。”

⑦見拙文《所以+主謂式已見於〈黃帝內經〉補疑》，載《中國語文》1993年第6期。

⑧見王力《漢語語法史》第十章介詞和連詞189頁腳注①，載《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⑨一般認為從東漢到隋所謂中古漢語時期的語料相對欠缺，而恰在此時所謂的“偽書”又偏多，如《孔子家語》《列子》及《尚書》偽孔傳等，這些“偽書”尚有可利用的價值。筆者將另有專文討論。

⑩見劉躍進《有關〈文選〉“蘇李詩”若干問題的考察》，載《結網漫錄》，學苑出版社1997。

⑪見方廣錫《佛教典籍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

⑫同③。

⑬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二節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

⑭見洪誠《關於漢語史材料運用的問題》。

⑮見洪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

⑯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原序。

⑰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三節漢語史的研究方法。

⑱同⑮。

⑲同⑦。

《孟子》趙注中的並列複合結構

張聯榮

中古時期，漢語詞彙的複音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是這一時期漢語發展變化最重要的標誌之一。這種加速發展的趨勢在這個時期的各種文獻資料中都有所體現，其中也包括許多注釋家對各種典籍的訓解。東漢時期趙岐的《孟子章句》就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注釋文獻之一，本文着重分析《孟子》趙注中出現的並列複合結構的各種情況及其特點，並對研究漢語詞彙複音化中遇到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

從對《孟子》趙注的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以一個並列的雙音結構對應《孟子》中的一個單音詞進行訓釋，這在趙注中是普遍的、大量的，表現出一種以雙音釋單音的鮮明而強烈的傾向。如（文中引例後加注的頁碼為上海書店影印的《諸子集成》本。為節省篇幅，不再加注篇名。文中“孟”指《孟子》原文，“注”指趙岐的注文。）：

1 孟：“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注：“愿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37）

2 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灌洞纖微，恰于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118)

- 3 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

注：“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饑餒矣。”(119)

- 4 孟：“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200)

如一般所認為的那樣，漢語詞彙雙音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為了使一個詞所表達的意義更加明確，避免意義的含混和交流時的誤解，更加有利于交際。從趙注的情況看，詞義的明晰化是趙注大量使可用雙音結構的最重要的原因。粗略考察可以知道，趙注中的雙音結構（僅指並列複合式，後同）有兩種情況：第一，在原有的單音詞之上再加上一個詞根語素（如上舉各例）。第二，另選兩個詞根語素合在一起解釋一個單音詞。如：

- 1 孟：“捆屨織席以為食。”

注：“捆，猶叩採也。”(215)

- 2 孟：“詩云：不怨不忘。”

注：“怨，過也。所行不過差矣。”(285)

- 3 孟：“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

注：“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309)

- 4 孟：“知好色則慕少艾。”

注：“艾，美好也。”(362)

5 孟：“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注：“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417)

兩種情況比較起來，第一種是大量的，佔有絕對的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加上那一個詞根語素常常是一個易于為人們所理解的“通語”或者“今語”，兩個語素結合後使詞的意義更加顯豁，顯示出趙注大量使用雙音結構的鮮明目的。如：

1 孟：“法而不塵。”

注：“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塵宅。”(134)

2 孟：“關，讖而不征。”

注：“言古之設關，但讖禁異言讖異服耳。”(135)

3 孟：“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注：“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137)

4 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注：“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139)

5 孟：“厥疾不瘳。”

注：“先使暝眩憤亂，乃得瘳愈也。”(189)

6 孟：“微者，微也。”

注：“微猶人微取物也。”(197)

7 孟：“厲民而以自養。”

注：“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215)

8 孟：“上無道揆也。”

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286)

二

從結構形式看，趙注中出現的大量的並列式的雙音結構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並列形式的雙音複合詞。第二，自由詞組。

第三，介于雙音詞和自由詞組之間的一種並列式的複合結構（以下簡稱“複合結構”）。

趙注中的並列複合詞如：

驚駭 (138) 鄙賤 (242) 放縱 (254) 險阻 (264)
禽獸 (264) 等級 (237) 操行 (275) 富貴 (276)
規矩 (278) 方員 (278) 法度 (284) 獨自 (284)
橋梁 (320) 國家 (320) 刑法 (320) 瞻仰 (324)
教誨 (325) 患難 (326) 變化 (327) 遺忘 (336)

趙注中的自由詞組如：

- 1 孟：“捆屨織席以為食。”
注：“賣屨席以供食飲也。”(215)
- 2 孟：“西子蒙不潔。”
注：“蒙不潔，以不潔污巾帽而蒙其頭也。”(343)
- 3 孟：“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
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結己，斯可受乎？”(412)
- 4 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注：“心之所同者者，義理也。……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451)

除了雙音詞和自由詞組，我們又分出一類稱為複合結構。上面第一部分中學的例子都可以看作是一種複合結構。之所以把複合結構單另列為一類，是因為這類結構確有其既不同于雙音詞、也不同于自由詞組的一些特點。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構成複合結構的兩個語義單位都是詞根語素，它們各有自己的詞彙意義，既可以合起來構成同一個整體，又可以拆解開來分別加以訓釋，表現出相對的獨立性。如（下面的例子有的是《孟子》原文中的）：

- 1 孟：“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86）

2 孟：“我于辭命則不能也。”

注：“我于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126）

3 孟：“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注：“明修其政教，審其刑法。”（132）

4 孟：“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注：“且以大作樂怠情教游……”（133）

5 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注：“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其曲心。”
（228）

6 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

注：“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237）

第二，從結構上看，構成複合結構的兩個詞根語素在組合次序上可以前後倒置，表現出較大的靈活性。如：

1 （1）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89）

（2）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注：“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92）

2 （1）孟：“耕者助而不稅。”

注：“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136）

（2）孟：“滕有倉廩府庫。”

注：“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215）

3 （1）孟：“古者棺槨無度。”

注：“古者棺槨薄厚無尺寸之度。”（165）

注：“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165）

4 （1）孟：“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注：“命之，猶言受命教矣。（239）

（2）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